

# 文心雕龙选译

周振甫 译注  
黄永年 审阅

古泉

文史名著

选译

丛书

珍藏版

主编 章培恒 安丰秋 马樟根



# 文心雕龙选译

周振甫 译注  
黄永年 审阅

古代

文史名著

选译

丛书

（珍藏版）

主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文心雕龙选译 / 周振甫译注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7. 1

(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: 珍藏版 / 章培恒, 安平秋, 马樟根主编)

ISBN 978-7-5506-2493-1

I. ①文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文学理论—中国—南北朝时代②《文心雕龙》—译文③《文心雕龙》—注释 IV.

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7460号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文心雕龙选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主 编     |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译 注 者   | 周振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编 辑 | 林日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 帧 设 计 | 姜 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<br>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<br>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   |
| 出版社地址  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网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fhcbs.com">http://www.fhcbs.com</a> |
| 照 排     |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|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<br>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 邮编:215104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850×1168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6.8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143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 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06-2493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| 31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-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512-68180638)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

## 前言

《文心雕龙》这部书，清朝章学诚称它“体大而虑周”，“笼罩群言”（《文史通义·诗话》），“自出心裁，发挥道妙”（《校讎通义·宗刘》）。谭献称“文苑之学，寡二少双”（《复堂日记》）。这是说，这部书在古代的文论中是体大虑周的，既是笼罩了有关各家著作，又是有独创的。这些评价，是有道理的。

这部书，包括了文学、文章学、修辞学、语法几部分。就文学、文章学说，有文学、文章学总论、文体论、创作论、文学史文章学史论、作家论、鉴赏论。就修辞学说，有风格、文采、炼意炼辞、章句对偶、比兴、夸饰、事类、练字、隐秀、指瑕。就文法说，《章句》篇里提到用字造句成章，又讲到了各种虚词。就文学和文章学理论说，对前人的学说都加笼罩，并提出自己的创见。这一切正是“体大虑周”，“自出心裁”。

刘勰的这种“文苑之学”，在古代还没有一个作者能够像他那样体大虑周地著为一书，包括这样丰富的内容，具有这样完整的体系。就这点说，确实是“寡二少双”、独一无二的。

### 刘勰和他的时代

刘勰（约 465—约 522），字彦和，生活的时代，在南北

朝的刘宋到梁代。他的祖籍在东莞莒(今山东莒县)。东晋时,莒县属北魏,东晋明帝在京口(今江苏镇江)侨置东莞郡。刘勰的祖和父都住京口,可知他也生在京口。史载:“勰早孤,笃志好学,家贫不婚娶,依沙门僧祐,与之居处,积十余年,遂博通经论,因区别部类,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,勰所定也。”(《梁书·刘勰传》)刘勰年轻时投靠定林寺的僧祐,有十多年时间,替僧祐编定定林寺的经藏。他编经藏前,先要“博通经论”,即对定林寺内所藏的佛经和其他佛家著作都博通了,才再按照各部类加以著录,并对各部类的书分别说明,最后写出序论。刘勰编著《文心雕龙》,利用了他编辑序录定林寺经藏的经验:先“博通”所有四部书,即当时所有的经史子集;再加上“区别部类”,对经史子集都有所论列,并选文定篇,研究各体文的著作要求,分别加以论述,这就同于编经藏的“区别部类,录而序之”了。

刘勰编定定林寺经藏以后,就著作《文心雕龙》。该书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(501—502)间。“既成,未为时流所称。勰自重其文,欲取定于沈约。约时贵盛,无由自达,乃负其书,候约出,干之于车前,状若货鬻者。约使命取读,大重之,谓为深得文理,常陈诸几案”(《梁书·刘勰传》)。刘勰把《文心雕龙》送请沈约鉴定,当在齐末梁初,所以“天监初,起家奉朝请”(可以参预朝会),当是沈约推荐的结果。接着“中军临川王(萧)宏引兼记室,迁车骑仓曹参军(都是萧宏手下的属官)。出为太末(今浙江衢州市)令,政有清绩。除仁威南康王(萧绩)记室,兼东宫通事舍人(昭明太子萧统手下掌呈文书的官)”。 “昭明太子好文学,深爱接之”(《梁书·刘勰传》)。僧祐在天监十七年

(518)五月卒(《高僧传》),梁武帝派刘勰去与定林寺僧慧震再整理经藏。完成后出家为僧,改名慧地,不满一年即死去。

刘勰经历了宋、齐、梁三个朝代,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。这个变动是从东汉末开始的。从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大一统以后,形成了豪族地主的武装割据。东汉时州郡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遭到破坏,魏文帝代之以九品中正制,在政治上给豪族地主特权,以取得他们的支持。从两晋到宋齐时代,经历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争夺政权的长期战乱,分成南北朝。东晋、宋齐偏安江南,为取得南方豪族地主的支持,实行九品中正制,造成了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族”的局面。再就当时人的学术思想说,东汉王朝提倡今文经学,宣扬谶纬迷信。到东汉后期的大儒马融提倡古文经学,不宣扬谶纬迷信,兼注《老子》,说明儒家学风在变。到曹操提倡刑名,儒家礼教更受冲击。“文体因之”,“渐尚通脱,脱则侈陈哀乐,通则渐藻玄思”(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)。到王弼、何晏用老、庄思想来讲《易经》,《易经》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称为“三玄”,玄学盛极一时。加上九品中正制的“上品无寒门”,豪门地主占据了高位,与玄学结合,造成“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,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,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,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,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”,“而世族贵戚之子弟,陵迈超越,不拘资次”(干宝《晋纪总论》)。在这样的风气下,晋代的文风,“缚旨星稠,繁文绮合”(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),追求华藻。加上“有晋中兴,玄风独振”(同上),造成玄言诗。于是,到了南齐的文风,便一种是“疏慢阐缓,膏育之病,典正可采,酷不入

情”；一种是“缉事比类，非对不发”，“唯睹事例，顿失精采”（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）。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针对当时的风气，要起来纠正。对于贵族仕宦的子弟占据高位，空谈而不务实事，他在《程器》里加以批评：“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！”“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！”主张“操文必在纬军国，负重必在任栋梁”。针对当时的文风，刘勰批评“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风”（《明诗》），“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”（《序志》）。指出文风有浮诡讹滥的毛病，他的《文心雕龙》就要纠正这些毛病。

刘勰既认为当时的文风有毛病，又称“魏晋浅而绮，宋初讹而新”（《通变》）。但他又赞美傅嘏的《才性论》，王粲的《去伐论》，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，夏侯玄的《本无论》，王弼的《易略例》，何晏的《无为论》、《无名论》，称它们都是“师心独见，锋颖精密”，“盖论之英也”。从这里来看，他讲当时文风的流弊，是就一般的情况说的。他并不因此抹杀当时杰出作家的成就。他的作家论也这样，对一位作家既看到他的优点，也不放过他的缺点，看得比较全面。这就证明他的评论，是有辩证观点的。

## 文之枢纽和文体论

刘勰在《序志》里把全书分为五部分：一、文之枢纽；二、论文叙笔；三、剖情析采；四、论时序、才略、知音、程器；五、长怀序志。兹分别说明如下：

一、文之枢纽，是文论的总纲。《序志》里称这部分“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”。就创作的根本问题看，结合文学、文章学的史的演变，结合当时的时代



背景,他要回答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,依据什么思想来指导创作。魏晋玄学起来后,加上佛教的盛行,于是依据什么思想来指导创作便成了问题。刘勰提出“本乎道,师乎圣,体乎经”来,就是要依据“道”来创作。由于圣人是通过经书来明道的,所以要“师乎圣,体乎经”。换言之,要学习儒家的圣人和经书,这是总的要求。所以要提出这个总的要求,还是为了纠正当时文风的弊病。当时文风的弊病,前面指出是浮诡讹滥。针对这样的弊病,要举出具体的、正确的作品来作模范。而道家、佛教的书都达不到这个目的,所以只能举出儒家的经书来。但他提出师圣、宗经时,他的看法也是辩证的。即以儒家的道和经为主,但又不排斥其他各家的道。在《原道》里就有取于道家的自然,在《诸子》里论诸子书,除了“弃孝废仁”和诡辩外,其他各家之说和文,有可取的都取,这又显出他所见的广博。但另一方面,在《论说》里又指出“本乎道”要“师心独见,锋颖精密”,不能只依傍一家学说来写。在《诸子》里指出汉人依傍儒家来写,就不如先秦诸子的自开户牖了。《明诗》里指出,东晋依据道家思想来创作,也失败了。说明创作还得靠创造,所谓师圣、宗经只能作为效法的榜样,还要通过自己的认识来创作,而不能照抄别人的思想。这样,他也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,即怎样对待不合乎儒家之道的书。结论是要采取其中可取的部分,即使如纬书那样,虽然不可取,也应酌量采用它的辞采作为创作的资料。第三个问题,怎样解决文学的依时演变问题。对此,刘勰提出“变乎骚”来,即从《离骚》里去学习文学的因时演变。

在“变乎骚”里,刘勰的看法又是辩证的,即不是专讲《离骚》的新奇。他通过分析,指出《离骚》在哪些方面是继

承经书的,哪些方面是新变的,即把继承和新变结合起来谈;又在《通变》里对继承和新变作了发挥;在《时序》里又具体指出《离骚》的新变“出乎纵横之诡俗”,以及怎样吸收了当时纵横家游说夸张之风,从而对文学的演变作了新的发挥。在学习“变乎骚”时,又提出“酌奇而不失其贞,玩华而不坠其实”。他是要求要有选择的学习的。

再看刘勰的文体论,即“论文序笔”。在这部分刘勰要回答两个问题:

一、怎样分文和笔。在刘勰之前,颜延之曾提出三分法:有韵为文,无韵而有文采的为笔,无韵而无文采的为言。这样,《诗经》是文;传记即解释经的书,如《左传》等无韵而有文采的是笔;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春秋》等经无韵而无文采的是言。这个分法,跟刘勰论文主张宗经就发生了矛盾。照颜延之的说法,除《诗经》外,别的经都不是文,那么论文怎么宗经呢?这个说法,在当时很有影响。比如,昭明太子萧统编辑《文选》便采纳了颜延之的“文笔三分法”。他在《文选序》里称:“若夫姬公之籍,孔父之书,与日月俱悬,鬼神争奥……岂可重以芟夷,加之剪截?”表面上说,经书与日月争光,不能节取,所以不选。实际上认为经书是言,不能入选,不过他不像颜延之敢于老实说出。他又说:“老、庄之作,管、孟之流,盖以立意为宗,不以能文为本,今之所撰,又以略诸。”子书不是文,也不是笔。而《文选》里也选笔,所以子书也可以不选了。“至于记事之史,系年之书,所以褒贬是非,纪别异同,方之篇翰,亦已不同。”史部书不选,在于它们与“篇翰”不同。“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,序述之错比文华,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。故与夫篇什,杂而集之。”就是说赞论序述有辞采文华的也在选取之列。

由此看来,萧统是赞成颜延之的意见的,而且像上面关于“赞论序述”的认识,比颜延之讲“传记则笔而非言”讲得更清楚些。

刘勰论文却与上述观点不同。因为他要纠正当时文风的弊病,所以要提倡宗经,而宗经就得承认经书是文,不是言。对此,他先举出《易》为例,说:“《易》之《文言》,岂非‘言’文?”(《总术》)《易经》的乾卦、坤卦里有《文言》,标明这些言是文的,所以《易经》是文。但这话的理由不充分,因为对方可以说:《文言》是文,可是《文言》以外的《易经》有很多不是文。或许刘勰也看到了上面的话理由不充分,所以他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进一步说:“精理为文,秀气成采。”(《征圣》)只要理精气秀的都是文。理精是就理说,秀气与情有关,即抒情生动突出之意。经书中富有精理秀气的文辞,所以经书是文。子书、史书也一样,所以子书、史书也是文。现在以有形象或抒情的为文学,所以讲先秦文学,有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,把子和史中的大部分归入文学,对经书中的大部分也如此看待。刘勰不讲形象,他以“精理秀气”为文,在《物色》里以“情貌无遗”为文,而提到“情貌”,就已有情和形象在内;又讲“秀气”,跟突出情有关;他论各体文又讲风格,这又跟文学有关。由此可见,刘勰的看法,以秀气、情貌无遗和构成风格的为文学,更与现在的所谓文学接近些。而颜延之、萧统对文学的看法,则显得过于狭隘。

二、分体选文的标准和对各体文的写作要求。在分体上不能多谈,只举一例。如刘勰称“杂文”这一体,包括宋玉《对楚王问》、枚乘《七发》、扬雄《连珠》、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。萧统《文选》把宋玉《对楚王问》归入“对问”类,东方

朔《答客难》归入“设论”类，枚乘《七发》归入“七”类，陆机《演连珠》归入“连珠”类。刘勰的“杂文”一类，萧统分为四类，说明萧统的文体分得更琐碎了。其实“对问”、“设论”和“七”都是主客对话，刘勰把它们归入一类，更恰当些。再就选文定篇说，在这里也不能多讲，只举一例。如刘勰《诠赋》是就赋史来讲，赋原是《诗》的六义之一，发展到《楚辞》，范围拓展，最早有荀况《礼》、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、《钓》。至汉朝有贾谊的骚体赋，枚乘、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的汉大赋，枚皋的咏物小赋；又讲到魏王粲的抒情小赋。再看《文选》的赋，分了“京都”、“郊祀”、“耕籍”、“畋猎”、“纪行”、“游览”、“宫殿”、“江海”、“物色”、“鸟兽”、“志”、“哀伤”、“论文”、“音乐”、“情”十五类，都是按内容来分。这样分，过于烦琐，看不出赋的发展变化。而刘勰的分法，是先从体制分：一类是“京都苑猎，述行序志，并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”，是体制大的赋；一类是“庶品杂类”，“言务纤密”，“斯又小制之区畛”，是体制小的赋。再从内容结合风格分：“宋发夸谈，实始淫丽；枚乘《苑园》，举要以会新；相如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”，“孟坚《两都》，明绚以雅贍；张衡《二京》，迅发以宏富”。即分为淫丽、会新、繁艳、雅贍、宏富等不同风格。这样分类，比只按内容来分类，对读者了解赋要好得多。再就对文体的写作要求说，刘勰论赋称：“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观，故词必巧丽。丽词雅义，符采相胜。”反对“繁华损枝，膏腴害骨”。讲得扼要而明确。再如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论赋称：“夫假象过大，则与类相远；逸辞过壮，则与事相违；辩言过理，则与义相失；丽靡过美，则与情相悖。此四过者，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。”按这样要求来论记实文章是极对的，论赋就不一定合适。如汉

大赋,是要讲夸张,免不了“假象过大”,“逸辞过壮”,“辩言过理”;赋要富文采,就不免“丽靡过美”。对赋,不必要求它避免这四过,应该要求“丽词雅义”就可以了。这说明在文体论上,刘勰确有高出前人和同时人的地方。

## 创 作 论

刘勰讲创作论,择要说,主要有五点:一、创作构思,即《神思》;二、风格,即《体性》、《风骨》;三、情貌无遗,即《物色》;四、修辞学。至于《通变》,在“文之枢纽”的“变乎骚”里讲了;《情采》讲两种文采,在“论文序笔”里讲了。

一、创作构思。《神思》里提到“神与物游”,即先要观察外物。有了主观偏见,对新事物就看不进去,所以要虚心;要是粗心浮气,就看不仔细,所以要静心,因此提出“贵在虚静”。通过观察,引起作者的情思,这就是“志气统其关键”,“志”跟思理有关,“气”跟情绪有关。在引起情思时,要考虑到所引起的情思是否深刻、正确、生动、具体,这又和自己的学识、理论、阅历有关。因此,在平时要“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”,要积累学识,酌取理论,研究阅历。有了较深刻而正确的情思,配合上自己的经历,就显得生动具体,再顺着这些情思来写成文辞。这些情思配上生动的经历,所以写出来才能“物无隐貌”。为了要写成骈文,写作时还要讲究声律。情思已经具体化,形成意象,所以要“窥意象而运斤”,进行笔削。从引起情思到构成意象,根据意象来写成言辞,所谓“意授于思,言授于意”,意象是创作构思的关键。形成了意象才完成了创作构思,这里有“密则无际,疏则千里”的分别。

怎么会有疏或密?怎样求得密而避免疏呢?陆机《文

赋》序里提到“恒患意不称物，文不逮意”。“意”即意象。意象从观察外物引起的情思来，要是所引起的情思不与外物相称，那么由情思构成的意象自然也成了“意不称物”了。怎样避免意不称物，陆机没有讲。刘勰讲了，即在由观察外物所引起的情思，使它深入而正确，即由积学、酌理、研阅得来，这才跟外物相称，由这样的情思所构成的意象，自然与物相称了。陆机又讲：“应感之会，通塞之纪，来不可遏，去不可止。”在观察外物时，有时引起情思，这就是通；有时引不起情思，这就是塞。“通”就是“意授于思”，“密则无际”；“塞”就是“疏则千里”。怎样求通去塞，陆机说“未识夫开塞之所由”。刘勰讲了，即“心总要术，敏在虑前，应机立断”，这是“开”。对所观察的外物，由于积学、酌理、研阅，在观察前先有一个看法，到看了以后，立刻可以作出判断，引出情思，这就“通”了。要是“情饶歧路，鉴在疑后”，就可能会“塞”。倘对于所观察的外物，事前一无所知，看不懂，拿不出意见来，这就塞。看后发生疑问，经过研究后拿出意见来，即由塞到通。塞和通的关键，在于对所观察的外物有没有积学、酌理、研阅，即有没有深切理解。陆机所不能解决的创作构思问题，刘勰都能解决，这正是他的高明处。

二、风格。陆机《文赋》里讲风格：“夸目者尚奢，惬心者贵当，言穷者无（唯）隘，论达者唯旷。”即浮夸与贴切对，简约与畅达对。即四种风格构成两对。又讲文体的风格：“诗缘情而绮靡，赋体物而浏亮”等，即认为诗的风格是绮靡的，赋的风格是浏亮的，即清明的等。刘勰的讲风格就不同了。《体性》里讲：“雅与奇反，奥与显殊，繁与约舛，壮与轻乖。”四对八种风格，并对八种风格作了说明。此外，

他还讲到风格的形成由于才、气、学、习所构成的个性，结合个性来讲风格是讲作家风格，讲了不少作家的风格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里也讲到作家的风格，如“应璩和而不壮，刘桢壮而不密”。远不如刘勰从作家个人的才、气、学、习所构成的个性，结合个性来论作家个人风格的深入。讲到文体的风格，陆机只就一个文体举出一种风格，如诗绮靡，赋浏亮。刘勰就不同了，如《明诗》讲到汉代的古诗，称为“直而不野”而“婉转”，张衡《怨》篇的清丽，建安五言诗的慷慨磊落而昭晰，何晏诗的浮浅，嵇康诗的清峻，阮籍诗的深远，晋代诗的轻绮，郭璞诗的挺拔，四言诗的雅润，五言诗的清丽。在这里，谈到诗的风格有各种各样，复杂多变。这样一比较，便显得陆机讲的太简单了。更突出的，在《风骨》里基于情和辞两方面，刘勰还提出一种“刚健笃实，辉光乃新”的风格来。

三、情貌无遗。西洋讲文学强调形象，中国古代讲文学强调意境。简单说来，意境即情思和景物的结合，《物色》就谈到了。《物色》里称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，把物、情、辞三者结合。在写物色时，“既随物以宛转”，“亦与心而徘徊”。在描绘景物中，也表达出作者的情思，做到“情貌无遗”。用《诗经》来做例，它的描写物象，用辞极为简练，同时又表达了心情。如“‘灼灼’状桃花之鲜，‘依依’尽杨柳之貌”。在“灼灼其华”里，用像火的红艳来形容桃花，这是描绘物象；又用“灼灼”来写新嫁娘的热情如火，这是写人的心情。又如“杨柳依依”，用“依依”来描写柳条的柔软，这是描绘物象；又用“依依”来写送别时双方依依不舍的感情，这是写人的心情。这就写出“情貌无遗”，成为古代即景抒情、情景交融的写法。

四、修辞学。《文心雕龙》里的《熔裁》讲修辞的炼意炼辞，《丽辞》讲修辞的对偶格，《比兴》讲修辞中的比喻格和起兴，《夸饰》讲修辞中的夸张格，《事类》讲引事引言，属修辞中的引用格，《练字》属修辞中的练字，《指瑕》属修辞中的修改错误或缺点，《隐秀》的“隐”属修辞中的含蓄格，“秀”属修辞中的精警格。这许多格，在这里不可能都谈到，就讲《比兴》的比吧。比指比喻，有比声音的，“宋玉《高唐》云：‘纤条悲鸣，声似竽籁。’”这是用吹竽来比声。“枚乘《菀园》云：‘森森纷纷，若尘埃之间白云。’”这是用尘埃夹杂在白云里，比鸟飞得快，是比形象的。“贾谊《鹏赋》云：‘祸之与福，何异纠缠。’”用三股打成的绳比祸福的纠缠在一起，这是用物来比理。“王褒《洞箫》云：‘优柔温润，如慈父之畜子也。’”这是用人的爱心来比箫声。“马融《长笛》云：‘繁缛络绎，范蔡之说也。’”这是用辩士范雎、蔡泽的游说来比笛声。说明比喻通过形象来比，有种种不同。

## 其 他

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四部分，《时序》讲文学史，《才略》讲作家论，《知音》讲鉴赏论，这三篇比较重要。

《时序》讲文学史，就文学的演变来说，讲了各种原因。其中有的是发展的，有的是走下坡路的，都举出具体例子来作说明。还讲了文学演变的总的规律，这是值得注意的。此外，《物色》讲“情貌无遗”，主要是就景物说的。《时序》里讲到文学跟时代政治教化的密切相关，这就接触到文学同社会生活相关。跟《物色》配合，显出文学反映生活的作用，看得更全面了。

《才略》里讲作家论，可与《时序》的讲文学史相配合。



《才略》里有显示刘勰的独特看法的,像对曹丕、曹植的评价,认为各有短长,跟一般的推重曹植、贬低曹丕不同,讲得是有见地的。又称王粲的诗赋为“建安七子”之首,这点也是有眼光的。又称郭璞的作品“足冠中兴”,也显出他评价的确切。此外,对于有的作家既指出他在创作上的成就,又指出他的不足,看得全面,也是好的。钱钟书先生《七缀集·诗可以怨》里,推重《才略》里的讲冯衍“《显志》、《自序》亦蚌病成珠矣”,是“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”。又引述西洋几位作家也用过这个比喻,指出“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,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”,“可是,《文心雕龙》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”。

《知音》是鉴赏论。在鉴赏论里刘勰提出几种毛病:一是贵古贱今,贵远贱近;二是文人相轻,崇己抑人;三是信伪迷真;四是知多偏好,人莫圆该。怎样避免这些缺点?刘勰提出博观,“观千剑而后识器”,看得多了,自然会分别好坏。还要“操千曲而后晓声”,不是“听千曲”而是“操千曲”,要自己演奏。鉴赏作品,不光重多看,还要会多作,这样对创作更有体会,即不光多看还要多实践,这才更能分别好坏。这样看,胜过王充《论衡·案书》里反对“谓今之文不如古”而提出的“才有浅深,无有古今;文有真伪,无有故新”。那么怎样分别浅深和真伪呢?不会分别,只说今胜于古,也是不可靠的。所以刘勰提出“观千剑”、“操千曲”的博观和实践来提升自己分别浅深真伪的本领,更胜于王充。葛洪《抱朴子·钧世》说:“且夫《尚书》者,政事之集也,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。”他认为今胜于古,因为今文清富赡丽。就政事书说,首先要记实,要真实质朴,不求清富赡丽。这样来确定今胜于